

德国民俗学与日常研究

以德国蒂宾根大学民俗研究所对乡村的日常研究为中心

LEE Sang-Heong
李 相 贤

安东大学校

(金英姬译)

1. 序言

自1970年始，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民俗研究所为了研究乡村的日常生活，对其附近一个叫做Kiebingen¹的农村进行了为期数年的调查。“日常(Alltag)研究”中所谓的“日常”，并非是指单纯的、反复的日常，而是指多种多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所形成的空间的日常，一般以E.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为认识论基础。因此，日常研究又被称作“研究日常生活”或者“日常生活世界研究”，并在众多的领域得以发展。

日常研究肇始于主张从现象学角度切入并研究生活世界的A. Schütz，之后便广泛地被引入到众多分科领域中。在将文化作为核心概念展开研究的民俗学或人类学等学术领域中，为了探究在文化的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引入日常研究。

日常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各个领域，如生涯史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劳动者文化研究、民众文化史以及乡村研究。²尤其是在此前的乡村研究中，学者们都把乡村看作是一个共同体，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几乎并不关心。可以说，在乡村研究中导入和运用日常研究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德国民俗学新的研究倾向。

本文首先将介绍并分析Kiebingen村调查研究的背景和过程，此研究被认为是德国民俗学乡村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归纳出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特点。

为此本文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1960~70年代在H. Bausinger主导下成立的蒂宾根大学民俗研究所的研究倾向和特点。而这又涉及到该研究所1950年代由Bausinger带领下进行的对移民地区的研究。因为在Kiebingen村的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Jeggle在该研究所工作过，自然也受到了Bausinger的移民地区调查的影响。

随后笔者将分析Kiebingen村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特点。起初这个调查是以乡村居民的生活和民俗为主题的，但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日常研究的必要性被提了出来。本文将记述并分析这个过程。

之所以本文选择蒂宾根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特别是以Jeggle教授的日常研究为例来考察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是因为笔者本人曾长期在该研究所学习，对该研究所的研究倾向和特点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其次是曾长期担任该研究所所长的Bausinger教授的诸多研究成果业已翻译成日文出版，所以笔者相信比起德国其他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日本的民俗学界对该研究所的研究会有更多的了解和共鸣。³最后，Jeggle教授是该研究所中最先关注日常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丰硕多样且颇受学界重视。综上所述，本文选定Jeggle实施的对Kiebingen村的调查研究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

2. 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移民地区研究：乡村的社会学研究

二战结束后的 1945 年，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对曾居住在东欧地区，战后移民到西德的，即所谓“从故乡遭到驱逐的德国人（Heimatvertrieben）”的调查。当时，德国多个研究所都对德国移民在移居西德前的语言和民俗进行了集中调查。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这次调查也可认为是这些调查中的一环。⁴

然而蒂宾根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却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了调查的内容和方法。新的工作方向的设定和促进由在该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的 Bausinger 为中心，与其他两个研究员一起进行。⁵ 调查对象为战后组成的 Baden-Württemberg 州的 21 个移居地区，这些地区居住着从东欧移民而来的德国裔居民、统一之前的东德居民以及西德其他地区移民来的居民。

这 21 个移居地区从地形位置或居住人口的规模和特点上看具有非常广泛的多样性，研究人员未对此采取一定的形式来记述，而是从五个最为必要的项目入手调查和记述。第一、移居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战后移居地区的历史；第二、地形、地理特征；第三、人口的构成特征；第四、社会及宗教生活的特征；最后是移居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五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为：在移居地区的历史方面，主要从开发历史及建设主体来记述；地理性特征方面，从移居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方面来记述；人口构成特征方面，从移居地区居民的出身地区以及职业等方面来记述并分析；社会生活的特征方面，从家庭及亲属生活以及邻里关系、体育爱好者协会活动等地区内团体活动来记述；宗教生活的特征方面，则提到了该地区居民的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教会的活动特点；最后，存在的问题方面，记述了缺乏考虑移住居民文化特点的许多文化设施的问题，由不同的出身地区的文化差异导致的邻里之间的罅隙，以及在移居地区的新文化中产生的家庭间的矛盾等问题。

该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对于这 21 个移居地区的调查内容进行分析。分析对象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移居地区组织运营起来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其次是在新的移居生活中被采用的民俗，然后是移居地区的规划制定和运营，最后是对故乡的认识。

第一、关于移居地区组织运营起来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研究人员根据构成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移民的出身地区、世代、居住位置等不同，把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分门别类，同时分析了它们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环境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对于新的移居生活中被采用的民俗，研究人员用到了“文化资产”这个概念。⁶ 移居地区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这些移民们为了在移居地区维持共同体生活，赋予了他们在移居前的地区学习、传承的文化以新的意义。对文化资产的研究，可谓是民俗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 Bausinger 的研究团队更多地关注移居地区产生了新变化的文化资产，他们分析了变化的主体以及变化后的形态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第三、有关移居地区的规划制定和运营的分析，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参与设计移居地区的公司的规划特点和展开过程。特别记述了移居地区居民在居住过程中发生的多种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居民们所付出的努力，并且研究人员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四、移居居民对故乡的认识的分析。对于故乡的认识主要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上进行，对于过去特定的空间的记忆和回忆成为对于故乡认识的基础。而且移民到移居地区的人们，特别是

从东欧地区过来的移民对于故乡有着强烈的印象和认识。

研究人员分析并归纳了移居地区居民对故乡的认识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他们如何运用文化资产，不同出生地所带来的对故乡的认识的差异，以及随着定居时期的不同对故乡的认识的变化。一般来说移居地区的居民对于故乡的认识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在定居初期心理上的不安感会增强；然后在与同乡接触过程中会结成乡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最后用多种方法表达出对故乡的兴趣。然而上述的对故乡的认识和活动的三阶段乃至文化资产的运用，因移民的出生地区、世代、居住时期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少的差异性。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移民对故乡的认识的特点，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德国民俗学研究的核心术语之一“部族 (Stamm)”概念。德语中的“部族”，指在特定地区持有相同的文化，使用德语的集团。当人们以自己的地区为中心，对其他地区的居民怀着否定的认识时便会使用这个术语。这种现象在该调查的对象地区也能见到。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指出这个术语在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往往错误地被认为是客观性的事实。

此次调查研究十分重视社会性语境，这点从副标题中的“民俗、社会学调查”的称法中也能窥知一二。与以往民俗学的乡村调查中常把乡村看做是特定民俗存续的场所，或是把乡村看做进行共同体生活的空间不同，该研究旨在反映出战后德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因此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的好评。⁷

Bausinger 通过此次对移居地区的调查研究，促进了对“民俗主义 (Folklorismus)”新的理解，提出必须对文化产业和旅游观光有新的认识。⁸此外他对诸如连续性、共同体、部族、规范等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性探讨。从他在 1959 年起担任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后，该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用通俗文学研究代替故事，歌谣研究代替民歌，社会性功能研究代替遗留物的历史考据，语言社会学研究代替方言语言学。⁹

直至 1960 年，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研究主要是对以往的民俗学研究的批判为主，而 1970 年后，特别是在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以后，该研究所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提出民俗学新的研究方向上。

3. 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更名和Kiebingen调查研究: 乡村的日常文化研究

1969 年，“68 学生运动”正以西欧和美国大学的大学生为中心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德国的 Detmold 召开了一场德国民俗学学术大会。在这次学术大会上与会者们对德国民俗学的政治社会的立场、民俗学的理论以及是否要继续使用意味着民族或民众的 Volk 这个术语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意见交换。并且在一年后于 Falkenstein 召开的特别学术大会上，与会者们就这些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在这次学术大会上与会学者达成一致认为“民俗学是分析在对象和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价值传递的学问”，并认定其“研究的目的是要对社会文化性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此后，德国各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根据各自对于文化和“Volk”的理解，讨论研究所名称的更换或设定新的研究方向，展开了一系列多样的活动。

这次学术大会后，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也将名称改为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所 (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 以下简称 EKW 研究所)。

研究所的更名除了受到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讨论的影响外，也受到 1970 年代德国大学教育改革一定的影响。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尽管各州有所区别，但相同的是将单科大学的专业更加细化，而学生可以同时履修多个专业，并且研究所的运营及规定变得可由研究所的教授全权决定。

1969 年，在 EKW 研究所以“Württemberg 地区的犹太人村落”为题取得博士学位的 Jeggler 研究员从 1970 年开始，历经数年对 Kiebingen 和邻近的乡村进行了调查。他的调查结果除了在学术大会做报告，向杂志社投稿发表，¹⁰ 还以专著书籍的形式进行了出版。¹¹

他的 Kiebingen 村调查原本同 Bausinger 的移居地区调查一样，试图通过调查特定乡村的变化面貌，揭示特定民俗的变化的意义。调查队为了与村民们建立融洽关系（rapport），主管了村里多项与民俗有关的活动。调查队的这种行动在村民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在当地的报纸上都得到了宣传，调查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然而，在对特定民俗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研究人员问起村里特定人物的影响力或者其它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力时，总是得不到村民们的明确答复。对此调查队认为是因为村民们不愿意向外部人员公开的这方面的信息。就在调查队苦思冥想应对措施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既是 Kiebingen 村居民，又是蒂宾根大学学生的 Albert Ilien。

Ilien 积极参加村里的同好会活动，与调查队一样非常关心村里的文化活动，而且他的妻子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同村里的许多居民都保持着比较活跃的日常交流。Ilien 参加了调查队，他将调查队所需要的信息明确地传达给了村里的居民，并且对收集来的信息向调查队提出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在与 Ilien 共同进行调查后，调查队将调查研究的目的调整为“调查该地区 and 人们的日常世界的独特性质”¹² (eigensinnigen Charakter der untersuchten empirischen Welt)，即关于乡村居民独特的日常世界的研究。他们调查了村民们独特的思考和行动源于何处以及如何变化的过程。因此调查不仅限于了解村子现在的情况，也包括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调查队列举了若干 Kiebingen 村居民的思维和行动的独特特征：如村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对财产的强烈执迷、前后不一致的家庭教育、对清洁的执着等。调查队认为导致村民饥饿、贫穷的直接原因是财产的平均继承以及子女众多，而这也引起了邻里间的不信任，兄弟姐妹间的罅隙，继承遗产的欺骗行为等问题。调查队认为村民的这种文化特征是该地区在 19 世纪由农业村落转变为工人村落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研究人员也收集整理了与此相关的历史资料。

地区的档案资料馆对从 1790 年以后到现在的 Kiebingen 村的历史资料毫无遗漏地进行了建档。调查队着重收集了 1820 年到 1890 年后半期，有关居民家庭的土地所有关系和在村子里的分布情况等相关的资料。

他们把这些历史资料分为五个研究对象，来考察当时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生活世界。首先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指出了曾以农业为主业的 Kiebingen 村在向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具体记述了村里的修道院的出售和居民的购买，在治理 Neckar 河的过程中政府与居民的矛盾和协调，行政体系的变化，教会的功能变化等，还记述了 1823 年绘制的村地图中出现的房屋和人口。

第二个研究对象为村里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劳动特点。记述了当时使用农耕地的特点，农产品的变化以及生产量的变化，原行政单位 Gemeinde 转变为从事农业的协议体的过程，与

衣食住相关的日常生活的特点，男女老少的家务劳动分担，家庭财产分配和汇集的样态。并且根据出生记录以及因不伦而产生的出生问题的记录分析了居民的性生活。当时女性由于繁重的劳动，婴幼儿死亡率比较高，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因经济困难不能结婚导致私生子的人数很多。该研究认为 1970 年代居民普遍对孩子缺乏关心与这一段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关联。接着研究还记述了 19 世纪村里的庆祝活动，尽管存在因高强度的劳动和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问题，但是人们为了家庭和村子的存续，继续维持着这些庆祝活动。

第三个研究对象为村民对财产的继承和使用。研究根据财产的保有形态将村民分为上流、中流和下流三个阶层，调查了从 1823 年到 1897 年期间各个阶层的财产的变化过程。此外，为了分析财产的流向，调查了女性配偶的阶层、所属、出身地区并追踪了财产分配的过程。以此为基础，详述了当时亲族概念强化的过程，并且通过列举各个阶层的事例，分析了村民对于财富的认识。

第四个研究对象是村民认知体系的特点。分为本人和包含本人在内的集体、他人、私有财产（家、农土、家畜等）、自然等几个项目，分别分析了村民们的认识特性。村民从整体上都对家庭和亲族抱有强烈的纽带感，对他人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对私有财产具有强烈的执着，认为自然具有威胁同时又认为必须征服自然。这种对村民认知体系的分析提供了一种从居民的立场出发整理调查结果的方法，借以此描绘出居民的主观认知和想法。

第五个研究对象是村子动态的变化样态。研究具体记述了以栽培新的农作物和农机具的使用为代表的 Kiebingen 农业经济的特点，村内手工业的变化过程和特点，个人企业的形成背景和过程，最后分析了村里的低收入阶层持续地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sierung) 的过程。

之所以对引起村子变化的积极因素进行分析，是为了观察村民们在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时所采取的应对。特别是 Jeggel 关注 19 世纪 Kiebingen 村的变化，通过考察劳动和所有关系的维持和变化，分析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

Kiebingen 调查研究并未如以往的民俗学一样把乡村看做是一个共同体，而是把乡村看成是居民的生存空间，与其他居民共存的地点。以此为前提，将乡村的居民们按阶层、性别等细分成多样的集团，进而以居民的思维和行动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其集团生活方式、资产获得与维持的努力、如何满足基本的本能需求以及社会制裁。

此外，研究为了通过探寻居民生活的渊源和其变化的过程，系统地理解现今居民的日常生活，尝试了历史性的考察。¹³ 我们在 Jeggel 有关“日常”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他坚持日常生活研究应考虑到居民的历史经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日常，就是指多样的个人和集体生活的特定的世界，是人们对反映了个人和集团的历史经验的特定对象的认识方法。”¹⁴ 通过这种对日常的理解，他试图通过他的日常研究阐明 Kiebingen 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土地、汽车、家畜等财产，对于孩子、亲族或邻居，有着与民俗学者或者大城市居民不同的想法。

尽管 Jeggel 和他的调查员们在分析中也与其他民俗学家或人类学家一样，关注个别成员与其他成员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并变化的文化，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中也含有“劳动和生产方式形成文化”这种马克思式的文化概念。

当然，持有这种文化概念的不只是 Jeggel 教授，EKW 研究所的大部分教授都持有相同的立场。例如，在一本收录了 Jeggel 有关日常生活的论文的民俗学概论书中，负责撰写文化领域的 G. Korff 强调，文化是“社会·生态性的范畴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具体地研究文化，首先必须探讨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同时有必要分析个别的时代和空间内流通的与之相关的规范、价

值及态度等。¹⁵

马克思的文化概念通过同时代的东德民俗学家对“文化与生活的世界”（Kultur und Lebensweise）的研究，其有效性已得到了证明。在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上，对于不同阶层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主张被压迫的女性、劳动者等进行研究的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对东德民俗学的文化概念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Jeggle 在提出研究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的方法论的同时，也积极地引用了曾评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Henry Lefebvre 的理论。¹⁶

然而针对此次的 Kiebingen 村研究也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比起共同体的阶层研究，该研究过度强调通过阶层分类后的生活研究，特别是对于村里上流阶层的分析不仅比其他阶层要少，而且在记述的字里行间都暗含着否定的意味。另外，还有批评指出该研究遗漏了 Kiebingen 村从 19 世纪末开始到 1970 年间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指明纳粹时期村里上流阶层与下流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否仍与以前的时期相同。

4. 此后的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

在 Jeggle 的 Kiebingen 村研究之后，德国民俗学内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日常研究。本节将举其中日常史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参与 Jeggle 的 Kiebingen 村调查项目的 Wolfgang Kaschuba 和 Carola Lipp 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与 Jeggle 不同的研究对象、时期以及研究方法，开展了日常史的研究。¹⁷

他们把研究的对象时期设定为从进入工业化前的世纪中期始到纳粹时代为止的约 150 年期间，研究对象则选择家庭、亲族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内各职业群。他们在研究中分析了在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过程中，居民们为了生存而破坏或重新整合村内既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平衡的过程。

他们的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居民的“历史性经验”作为主要概念，研究了工业化以前时期由村里的不平等结构形成的经验是如何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再现出来的。例如，他们记述了家庭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中道德或行为规范的持续与变化因素，并将这之中的基本特性作为村里居民的历史性经验来进行研究。

他们在分析居民适应社会变化时所使用的“历史性经验”这一概念，是英国历史学家 E. P. Thompson 在分析英国劳动者时提出的。两位研究人员以此为基础，试图指出过去 150 余年间 Kiebingen 村的居民在社会性变化过程中的日常生活的规则。

如前所述，Jeggle 在分析乡村的日常时，运用了强调政治性压迫和经济不平等方面的 Lefebvre 的日常研究理论，以此使得对日常的变化研究成为可能。相比之下，Kaschuba 和 Lipp 的乡村研究在对象和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但分析乡村这个微观世界里生活的众多个人和集体的思维和行动的角度时，仍然受到了 Jeggle 的乡村研究的影响。可以说，Jeggle 的乡村研究对德国民俗学中日常史研究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¹⁸

除此之外，Kaschuba 以乡村的日常史研究为基础，也对工人文化进行了研究。他重点关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从农村地区移居城市的工人如何灵活运用移居前农村或渔村地区的经验以适应新的日常，以此展开了对工人文化的研究。¹⁹对工人文化的研究是原来民俗学几乎没有涉及的研究领域。在他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家开始关注工人文化。然而比起在德国的民俗

学界，他的研究在德国的历史学界、特别是日常史研究者之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好评。

德国民俗学中的日常史研究在以乡村为对象探讨居民的思维和行动时，往往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重新解读和再解释。另一方面，以 Jeggel 为代表的民俗学家们试图将当今乡村的日常放入与过去生活的连续性中进行理解，因此除了历史资料外还需关注并收集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实地调查资料。研究者在整理和解释收集而来的资料时，需兼顾调查对象的特征和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对于这种研究而言，不得不强调有关如何系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研究至关重要。

Jeggel 以他的 Kiebingen 村调查经验为基础，着手展开了顾及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研究。他与一些与他有着相同问题意识的研究者们共著出版了德国民俗学界第一本有关实地调查的学术著作。²⁰ 他在这本著作中批判性地分析了德国民俗学实地调查的历史，提出了针对日常研究的调查方法论。而该书其他作者们则探讨了针对日常研究的实地调查的战略、方法，以及根本性的不足。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德国民俗学中对日常史或日常文化等关于日常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的构筑只受到了 Jeggel 的 Kiebingen 村研究或 EKW 研究所的影响。除此之外，如历史学、社会学等民俗学的相邻学科领域对于日常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俗学对日常研究的兴趣和发展。

以德国历史学界为例，1970 年代开始，一些自称为“赤脚历史学家 (Barfußhistoriker)”的历史学界非主流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主导了“历史工房 (Geschichtswerkstatt)”运动，其中就采用了日常史研究。他们批评了以往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那种以统计材料为中心进而肯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研究倾向。他们更加关注平民 (kleine Leute) 的衣食住行、劳动与业余生活、家庭与邻里关系等日常生活的面貌，并以此开展研究。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对德国民俗学界的日常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传统的德国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关注并研究外形特征、住宅样式、服装形态等方面。然而进行日常史研究的德国民俗学家们援引历史学者的日常史研究的成果，从专注住宅的外型，转变为更注重研究居住在特定住宅内的人们的居住文化。²¹

本文重点讨论了 EKW 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或许有学者会批评指出本文在介绍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发端和发展方向时并未列举其他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比如，本文并未介绍德国民俗学中最先标榜做日常研究的，1970 年代的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后将研究所的名称更改为文化人类学的 Ina-Maria Greverus 的日常研究。必须承认这样的指摘是恰当的，本文并没有完成对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做完整而体系性的介绍。针对这样的不足，最后，笔者将粗略梳理一下德国民俗学及其相邻研究领域对日常研究的指摘和批判。

1990 年以后，学者们开始陆续指出日常研究，特别是日常史研究的不足和问题。首先，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方面，对于纳粹时代的研究，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生涯史的研究，加害人与受害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具有极端的两极分化的倾向，然而却很少有研究指出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学者们指出日常史研究中对女性的研究存在局限性。尽管女性在原有的历史学研究中缺乏关注，而在日常史研究中相对来说却进行得非常活跃。但是这些研究在分析特定时期女性的思维和行动时，并未联系当时的家庭或女性文化，而是投射入了现代女性的思维，或反之仅以当时女性的立场为中心进行研究，这些问题都受到了批评。

日常研究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学者们倾向于仅以文化的观点来解释特定的新的生

活和行动上。比如，研究者在说明欧洲很多国家对外国人的厌恶情感的背景和过程时，将之理解为文化性边境战略的一环，以形成这些结果的要素或者社会性问题等为基础分析此类行动的特性。然而，这显然是从不纯的政治学动机出发的，在客观性地理解之前有必要批判性地看待。

对日常和文化的研究和众多分科领域的研究一样，也需要苦心钻研多样的理论和方法论。日常研究虽然在现在以及在过去的历史中并非研究的主流，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组成特定社会中多样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正经历着如人种问题、政治斗争等过去的人们不曾经验的行为。在这样的时代，为了在以理解人为目标的学术研究中能更有效地运用日常研究，我们必须采取批判性的态度。²²

此外，还有批评指出日常研究在学术性实践活动中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有批评指出很多博物馆依据日常研究的学术成果，展出特定时期的日常文化，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其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展示对象以及展示技法的问题，以及缺乏有效地展示日常文化所必需的对象选择的原则等。这个例子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博物馆展示的问题，有理由相信，日常研究在对象选择和方法上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²³

为理解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特点，我们有必要理解研究的背景和过程，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 1990 年以来，以德国民俗学为代表的，进行日常研究的诸分科学术领域所提到的日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对于有志于吸取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从而构筑本民俗学新的范式的国家来说，直面这些批评的声音也显得尤为重要。

注

- 1 Kiebingen 村属于德国西南部的 Baden-Württemberg 州，位于德国南部地区天主教行政总署所在的 Rottenburg 市和教育城市 Tübingen 市之间。对该乡村的最早记录出现于 1204 年，当时属于 Hohenberg 贵族的领地，1381 年卖给了奥地利，1806 年归属于 Württemberg 王的领地。进入 20 世纪后，行政上属于 Rottenburg 市，战后属于 Tübingen 市，1971 年后又重新属于 Rottenburg 市。
- 2 Carola Lipp, 'Alltagsforschung im Grenzbereich von Volkskunde,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88, 1993, pp.12 ~ 19.
- 3 本文在准备过程中参考了日本民俗学对日常研究，特别是德国的日常研究的研究成果，如：花橋量，2010，「現代ドイツ民俗学のブルーリズム—越境する文化科学への展開—」，《日本民俗学》263 号。
- 4 德国民俗学家将这些研究称为“孤立言语研究”（Sprachinselforschung），研究内容为与东欧圈的其他民族共同居住的德国人的德语研究。可参考：Ingeborg Weber-Kellermann/Andreas C. Bimmer, *Einführung in die Volkskunde/Europäische Ethnologie*, Stuttgart, 1985, p.131 ~ 133.
- 5 此次调查结果出版书籍如下：Hermann Bausinger, Markus Braun, Herbert Schwedt, *Neue Siedlungen, Volk-skundlich-sozio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des Ludwig-Uhland-Institut Tübingen*, Stuttgart, 1958.
- 6 虽然引用的原著以意味着特定财产或者所有物的 Güter 为题记述分析这个项目，然而大部分分析对象为方言或格言等语言民俗、传统服装、乡土饮食等物质民俗以及民间信仰等宗教民俗，所以本文把这个术语翻译成“文化资产”。
- 7 Ingeborg Weber-Kellermann/Andreas C. Bimmer, *Einführung in die Volkskunde/Europäische Ethnologie*, Stuttgart, 1985, p.130. 在概论书中提到的另一个研究业绩还提到了 Wilhelm Brepohl, *Industrievolk im Wandel von der agraren zur industriellen Daseinsform, dargestellt am Ruhrgebiet*, 1957.
- 8 Hermann Bausinger, *Volkskunde. Von der Altertumforschung zur Kulturanalyse*, Berlin, 1971, p.141~209.
- 9 Hermann Bausinger, 'Zur Entwicklung des Ludwig-Uhland-Institutes', *Attempto*, Heft 49/50, 1974, pp.60 ~ 67.
- 10 最早有关 Kiebingen 的记叙是：Utz Jeggle, 'Urbanisierung ländlicher Entscheidungsstrukturen'. Gerhard Kaufmann(Hrsg.), *Stadt-Land-Beziehung. Verhandlungen des 19. Deutschen Volkskunde-Kongresses in Hamburg vom*

1. bis 7. Oktober 1973, Göttingen 1975, pp. 65 ~ 80. 此内容在当时的德国民俗学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学术大会上进行了发表。其他有关 Kiebingen 的记叙是：Albert Illen und Utz Jeggle, 'Zum Recht der kleinen Leute auf wissenschaftliches Verstandenwerden, am Beispiel Hausens, einer Gemeinde im Urbanisierungsprozeß', Konrad Köstlin und Kai Detlev Sievers, *Das Recht der kleinen Leute*, Berlin, 1976, pp.88 ~ 97, Utz Jeggle, Albert Illen, Willi Schelwies, 'Verwandtschaft und Verein. Zum Verhältnis zweier Organisationsformen des dörflichen Lebens'. *Forschungen und Berichte zur Volkskunde in Baden-Württemberg*. Bd.3, 1977, pp.95 ~ 104.
- 11 Utz Jeggle, Kiebingen - eine Heimatgeschichte, Tübingen, 1977, Albert Illen, *Prestige im dörflicher Lebenswelt*, Tübingen, 1977, Albert Illen und Utz Jeggle, *Leben auf dem Dorf.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Dorfes und Sozialpsychologie seiner Bewohner*; Köln und Oplanden, 1978.
- 12 Herbert Blumer, 'Der methodologische Standort des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ismus',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Hg.), *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ismus und Ethnomethodologie*, Hamburg 1973, pp.104. 此文在 Utz Jeggle, Kiebingen - eine Heimatgeschichte, 前述文献的 278 页再次被引用, 这篇文章在 Jeggle 的 Kiebingen 调查相关的众多记叙中都有引用。这句话可直译为“调查经验的世界的固有性质”, 本文采用意译。
- 13 Utz Jeggle, Kiebingen - Eine Heimatgeschichte, p. 280.
- 14 Utz Jeggle, 'Alltag', Hermann Bausinger 等, Grundzüge der Volkskunde, Darmstadt, 1978, pp.125
- 15 Gottfride Gorff, 'Kultur', Hermann Bausinger 等, 前述文献, pp.62.
- 16 Utz Jeggle, 'Alltag', Hermann Bausinger 等, 前述文献, pp.103~104.
- 17 Wolfgang Kaschuba/Carola Lipp, *Döfliches Überleben. Zur Geschichte materieller und sozialer Reproduktion ländlicher Gesellschaft im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 1992, Tübingen.
- 18 Wolfgang Kaschuba, *Einführung in die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München, 2003, p.127.
- 19 Wolfgang Kaschuba, 'Volkskultur und Arbeiterkultur als symbolische Ordnungen. Einige volkskundliche Anmerkungen zur Debatte um die Alltags- und Kulturgeschichte', Alf Lüdtke(Hrsg.), *Alltagsgeschichte. 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 Frankfurt 1989, pp.119 ~ 223.
- 20 Utz Jeggle(Hrsg.), *Feldforschung. Qualitative Methoden in der Kulturanalyse*, Tübingen, 1984.
- 21 Projekt Gruppe, 'Geschlechtsspezifische Muster der Raum- und Dinganeingung'. *Gestaltungs- spielräume. 4. Tagung der Kommission Frauenforschung in der Volkskunde*, Tübingen, 1992.
- 22 Wolfgang Kaschuba, 'Kulturalismus: Vom Verschwinden des Sozialen im gesellschaftlichen Diskurs',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91, 1995, pp.27 ~ 46.
- 23 Carola Lipp, 前述文献, pp.26~27.

(校对：施尧)